

黄帝之研究

王振堂 著



科学出版社

黄帝之研究

王振堂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立足于对1万年以来的以图画文字形式编著的“天书”的释读，初步但确定地给出了中国远古史上女娲时代及有蟠氏、伏羲时代及少典氏，特别是黄帝族群的真实存在。认为1万年前的山西吉县柿子滩“头顶七星脚踏六星蜂形人”天书乃黄图腾的源头。由宁夏贺兰山“骷髅十字”天书，与《说文解字》《周髀算经》《国语·晋语四》等相关材料，给出了媧与骷髅的考释。而8000年前的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出土的“三足双波纹潜十字四等分天地”彩陶钵是“典，五帝之书”及少典氏天书。特别是6300年前左右临潼姜寨遗址159号墓出土的“四分又八分天地阴阳五鱼”彩陶盆、贺兰山陶字天书、河南固始县汉画像砖的陶字天书、具茨山岩画的陶四联体与南北斗及极星同一画面均为帝字天书。结合《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材料，对帝进行了释读。全书初步、系统地体现出了媧、伏羲时代及黄帝族群实有其史、确有其事。

本书适合于从事中国远古文明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对此感兴趣的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之研究 / 王振堂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03-043933-8

I. ①黄… II. ①王… III. ①黄帝—人物研究 IV. ①K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587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肖丽娟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 16 787×1092

201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1 插页: 1

字数: 490 000

定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中国远古，在甲骨文之前，有一个漫长的由图画文字编写的天书时代。这些年来岩画与彩陶画的发现及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走向远古时代、阅读远古人们精心编著的天书的大门。2001年考古学界在山西吉县柿子滩岩棚发现一幅距今1.0万~0.9万年、头顶七星脚踏六星、亦蜂亦巫的岩画，我们称其为蜂形人岩画。它饱含着一万年前柿子滩人们对天文学（蜂形人带动南北斗，以北天极为中心，作大环绕旋转）、生态学（人与蜜蜂形成了特殊的相互依托的关系）、图腾学（姓氏来源及传承，或如有人说遗传密码）、图画文字学（甲骨文之前的象形文字）等初始的但却相当深刻的科学认识。这幅岩画内容传承性记载在《山海经》中，《中次六经》“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维蜂蜜之庐”；《海内北经》“大蠪其状如螽”“螭为人虎文，胫有臂，在穷奇东，一曰状如人”。现在一些学者经研究认为“骄，即螭”“螭即蜜蜂，是以蜜蜂为图腾”。由此可知人们已逐渐接近一万年前蜂形人岩画的本质。依据蜂形人的形象，可判定它是甲骨文中黄字的源头。蜂形人是黄图腾。

贺兰山有一幅距今1.0万~0.4万年的骷髅十字岩画，笔者称其为骷髅十字圭表。它同样包含着史前人们对天文学（这是靠日影定向、指路、计时、制历的聪明创造）、生态学（骷髅在野外经风吹、雨淋、日晒的变化）、图腾学（这是一幅描述图腾形象的岩画）、图画文字学（此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书）等诸多问题的初始的但却科学的认识。这幅岩画传承式的记载在《大荒经》中，“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淮南子·说林训》记有：“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乃女娲七、十之化也。”女娲七、十之化的“十”是有手臂、有耳目的。这个名曰女娲之肠的“十”与有手臂耳目的“十”，应该都是女娲的“十”。10年前王增永详细考释了媧，是由女、口、𠂔构成，𠂔“是被人剔完肉的人骨架”，是祖骨崇拜。两千年前的《说文解字》已经做了类似的考证，只不过长期以来，无人敢过问。“媧，从女𠂔声”，𠂔则由口及𠂔构成，而口“人所以言也”是表声的，𠂔，“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头隆骨也”，可知媧是女、口、头隆骨，应是远古人们发明创造的“骷髅十字圭表”。由《周髀算经》的卑、《说文解字》的卑、甲骨文中的卑，足证卑是圭表，是用一只手握“甲”，而“甲，人头空为甲”“人头空为骷髅”（《说文解字》）。

一万年前走来的蜂形人族群，骷髅十字圭表族群，两者可能就是一个族群，他们日益发展，十分强大，最后形成一个以“螭”为耦合图腾的族群。这个图腾以虫标示蜜蜂，以𠂔代表人，以𠂔表述骷髅。这个螭是一个氏族，在距今2600多年的重要国别史书《国语·晋语四》中有确实的记载：“昔少典氏娶有螭氏生皇帝、炎帝。”现代一些研究家们依据这一记载，肯定地认为“螭是黄帝的母亲氏族”，从而可以明确黄帝族群源

于一万年前的女娲（包括黄）。

距今8000年前左右，中国人发现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支点可以确定一个平面的数理公理。当时人们一定相当欣喜。在这一两千年间，广阔地域内几乎所有陶器类型中都出现了三足型器皿，我们称其为鼎盛时代。在鼎盛时代，距今8200~7300年，华县老官台遗址出现了一个沿外缘绘一圈红环，内绘双波纹潜十字四等分天地的三足彩陶钵。四等分是用来观测与确定二至二分点的。三足，充分证明是平置在地平面上（由所有三足器的使用可知）的，四等分潜十字构成一个地平坐标观天仪。一个水平“十”字是四卦，是初始八卦。进一步发展，在渭水流域见到更多的八等分天地的观天仪，那是八卦。这些三足八分天地的彩陶图正是《说文解字》中明确记述的：“典，五帝之书。”这也就是《国语·晋语四》所说的少典氏。

距今6300年左右，姜寨159号墓，保存的八等分的阴阳五鱼彩陶盆，是一万年以来的北斗天文学的有蟠氏与八千年前的八卦天文学的少典氏结合形成的以北天极为中心八等分天地的赤道坐标天文学的天书。是“帝”字天文学。其天文学意义是非九天则大畋的北天极为中心，南北斗绕北天极作小环旋转；其生态学背景是大批的种类繁多、形象生动、彩色鲜艳的狩猎野生动物图画缺白，而以活鱼为主要形象的生活时代。这部天书的内容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着清晰地记载：“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斗南中绳，日夏至”“斗北中绳，日冬至”。至少可以说中国古远的“帝”诞生于距今6300年前的姜寨，或其附近。

贺兰山还有一幅岩画，高嵩称其为“一张地图”，至少距今6000~4000年。这幅岩画的所有内容，几乎皆记述于两千多年前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这幅岩画中的囿，就是本书研究核心“帝”。河南固始县汉代画像砖中的囿，是两个“帝”。河南具茨山发现的岩画中有四联囿，进一步证明这个囿是与天上的大环有关。而天上大环不止一个。《吕氏春秋·有始览·序意》：“黄帝之所以海颡頡矣，爰有大环在上，大距在下，如能法之，为民父母。”其所言及的就是天上的大环。上述这些由图画文字编写的天书，初步释读，足以证明中国远古史的女娲、伏羲、黄帝是确实存在的氏族或时代。它们实有其史，实有其事。这些天书的编写，充分表述一万年以来，中国远古人们的，虽然是初始的，但却是严谨的天文学、生态学、图腾学、图画文字学的科学水平和科学成就。

目 录

序.....	(i)
一、背景	(1)
(一) 信息的垂直与横向扩散.....	(1)
(二) 距今1.3万 ~ 0.4万年我国古人群生存环境.....	(11)
(三) 考古学确认的距今1.3万 ~ 0.4万年的历史时期.....	(18)
二、天书	(29)
(一) 中国远古陶刻文字与陶绘天书.....	(30)
(二) 岩画、岩刻、骨刻及殷墟甲骨书契.....	(34)
(三) 《大荒经》是众帝之书.....	(42)
(四) 少昊天文学、七环四斗仪.....	(47)
三、骷髅十字圭表、女娲之肠、复合图腾螭.....	(56)
(一) 女娲时代.....	(56)
(二) 太极，立杆测影.....	(66)
(三) 骷髅十字圭表.....	(74)
(四) 女娲之肠.....	(82)
(五) 螭，复合图腾天书.....	(88)
四、黄，蜂形人图腾的文字符号.....	(94)
(一) 一万年柿子滩岩画.....	(95)
(二) 蜜蜂生态与蜂形人图腾形成的最小生态条件.....	(101)
(三) 螭，为人虎文.....	(107)
(四) 黄作神主.....	(116)

五、泰皇兴神鼎一·····	(123)
(一) 现今人们了解的八卦·····	(123)
(二) 远古天文学与天球坐标系·····	(129)
(三) 泰皇兴神鼎一·····	(133)
(四) 伏羲“是生子四口，是襄天地”·····	(142)
(五) 典、少典氏、五帝之书·····	(145)
六、黄帝生阴阳·····	(151)
(一) 姜寨遗址一期相关生态问题分析·····	(152)
(二) 少典氏娶于有蟠氏·····	(163)
(三) 非九天则大峽·····	(173)
(四) 黄帝生阴阳·····	(182)
(五) 女娲七、十之化·····	(193)
七、德与帝·····	(202)
(一) 远古四象与八卦的符号·····	(203)
(二) 德、姓、图腾·····	(209)
(三) 阴阳刑德·····	(212)
(四) 报德之维·····	(217)
(五) 帝是浑天仪·····	(221)
(六) “帝”字与帝·····	(227)
八、黑水、昆仑、北海考·····	(234)
(一) 阳紆山·····	(234)
(二) 《穆天子传》中的黑水考·····	(242)
(三) 昆仑与蟠·····	(250)
(四) 北海考·····	(256)
(五) 北海凹地·····	(266)

九、黄帝统一大业·····	(274)
(一) 东西两个强大的文化中心·····	(274)
(二) 吴、蚩与炎、黄的扩展路线·····	(280)
(三) 黄帝北伐黑帝·····	(287)
(四) 三场战争·····	(294)
(五) 青要山·····	(302)
(五) 大统一之后的活动中心·····	(308)
参考文献·····	(323)

一、背景

中国远古史在疑古派的“层累叠式”、洋奴派的“想像赋造”、西方海盗帝国思维及极端优等民族傲视一切的攻击面前，长期处于守势，先是退守至“远古神话”防线。

“神话”虽可以顽抗，但也不堪一击。于是一批研究者退守“历史传说”阵地，基本上放弃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乃至秦汉许多学者追宗问祖时所获得并保留下来的星星点点的，甚至是只言片语的极其珍贵的远古信息，将许多重要的科学问题浸泡在人为铸造的“传说”茧甲之中。凡言黄帝、炎帝，必以“传说”为前提。现今已有大量的相当丰富的有关远古历史的野外科学考古资料，信手拈来便可以充分证明黄帝、炎帝的真实存在，且其与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慎终追远之文献记载相符，然而，一些长篇巨幅的关于远古史的通俗读物，仍然停留在“传说”原地，实属令人费解。

人们在探讨黄帝源流，即华夏族群的源流时，为了跳出“传说”的茧甲，干脆从中国猿人那一个又一个骨骼化石、一堆又一堆燃烧灰烬、一批又一批打制石器、一幅又一幅生动岩画、一钵又一钵彩色陶器开始追宗问祖。它们描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的实际经历，展现了他们一步步走来的里程。本专题仅从长江、汉水、秦岭以北的地域，时间上则以距今1.3万~0.4万年为区段，以骨刻文字、陶刻陶绘天书、岩刻岩画为内容，十分简要地考释之。文献依据，仅以本人所能阅览到的相当有限的资料为主，以此为基础，系统地分析这一时空范围的远古人群信息中的有关黄帝的确实的历史。

（一）信息的垂直与横向扩散

1.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曾祥旺（1983，81）^[1]在研究百色地区旧石器时提出：百色地区的大尖状器，与陕西蓝田平梁地区的大尖状器、贵州观音洞的厚三棱尖状器、山西丁村大三棱尖状器、内蒙古大窑村南山的大尖状器，百色的铏形砍砸器与观音洞的半手斧砍砸器、丁村的似手斧石器及四川铜梁的铏形砍砸器类似。他认为，百色地区的旧石器，无论所使用的石料、加工的方法还是器物的式样，都与我国传统的旧石器一致。百色地区的旧石器和我国已报道的旧石器的一致性，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他认为，在时间上百色与观音洞的旧石器时期相近。所列举的蓝田、观音洞、丁村、大窑、铜梁等遗址虽然都是旧石器，但时间各有不同。如蓝田距今100万~70万年，丁村距今12万年，观音洞旧石器初期和铜梁距今2.16万年。在空间上，百色距观音洞不过数百千米，然而距离北方的蓝田超过1000千米，丁村、大窑更远于蓝田。在那样遥远的年代，又相隔1000千米以上，主要旧石器的石料选取、加工制作及器物式样却一致，倘若是偶然，那就不必深究了，但若是必然，则值得深入探讨。旧石器本身有那么

多值得深入探讨的一致性，那么旧石器整个时代中三个突出的、具有划时代特征的事物的一致性，不更应深入思考，甚至认真探讨？

黄崇岳^[2]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火的使用为标志，是用木棒和粗糙石器进行狩猎的阶段；第二阶段以石球与刮削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第三阶段，以弓箭的出现为标志。这就是说，火的使用、石球的制作、弓箭的发明各自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也应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传播继承关系。从距今100万~20万年的诸多遗址皆存在灰烬可知，在此期间火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从距今10万~5万年的诸多遗址中石球相当集中可知，制作石球的活动也已普及；弓箭的普及只能在距今1.2万~0.8万年实现。深入研究火、石球、弓箭的传播继承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华夏祖先的来龙去脉。

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恩格斯：《反杜林论》）；“火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郭沫若，1976，《中国史稿》）。中国远在18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及西侯渡遗址已有确切的用火足迹。距今100万~70万年的蓝田猿人、距今70万~50万年的北京猿人、距今30万~20万年前的金牛山、鸽子洞遗址皆有用火遗迹。距今20万~1.0万年的众多遗址皆有使用火的实证。就现有考古信息所积累的知识，很难分析判断这些用火遗址之间在用火机制方面有何种关联。但火的使用在华夏先民进化与统一中的作用应是非同寻常的。

火种，即火源、火种的移动及火种的保存；火堆的长期维持，即火的控制；柴材的运取及积存；等等，皆是远古先民面临的管理火的难题。火源，或因山林自燃、或雨天雷电引击、或人工击打燧石而获得。火种移动，从一处运往另一处，往往是必要的。远古时代，我国北方广布原始针阔混交林，林内随处可见大块松脂癭节，又称“松树明子”，一般长1~2米，宽10~20厘米，厚5~10厘米，呈扁长条块状，点燃后可缓慢燃烧，劈成小块后也可使用，取火及移动火种，甚至保存火种皆可靠它。火堆的长期燃烧，必须靠足够量的木材。少量的枯枝落叶及干枝，既难收集，又易于燃尽。对于远古人群而言，在原始林中易于获取、易于搬运又不易燃尽的木材是10~20厘米胸径的“站杆”，即林业上所说的“立枯木”。生长到10~20厘米胸径的“站杆”，因多种原因而枯萎，枯萎后，枝叶剥落，主干枯立。3~7年后，其材质仍很易燃烧，根部枯腐后易于推倒，且易于搬运及劈断。

前述石器的相近性，是否在火的使用上也有相近性，不得而知。中国猿人发展到新人，至少经历了180多万年使用火的过程。火可以烤熟食物，减少疾病，且烤熟的肉食可促进体质进步，加速脑髓的发展。火能御寒，克服了气候限制。火能防御野兽，降低夜间猛兽袭击的危险性。此外，火可改善居住条件。在这180万年期间，火的功能仍是这些原始的内容。只是到了制造陶器的时代，远古人群用火才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与石球

许家窑遗址（图1.1）距今13万~10万年，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古城镇乡许家窑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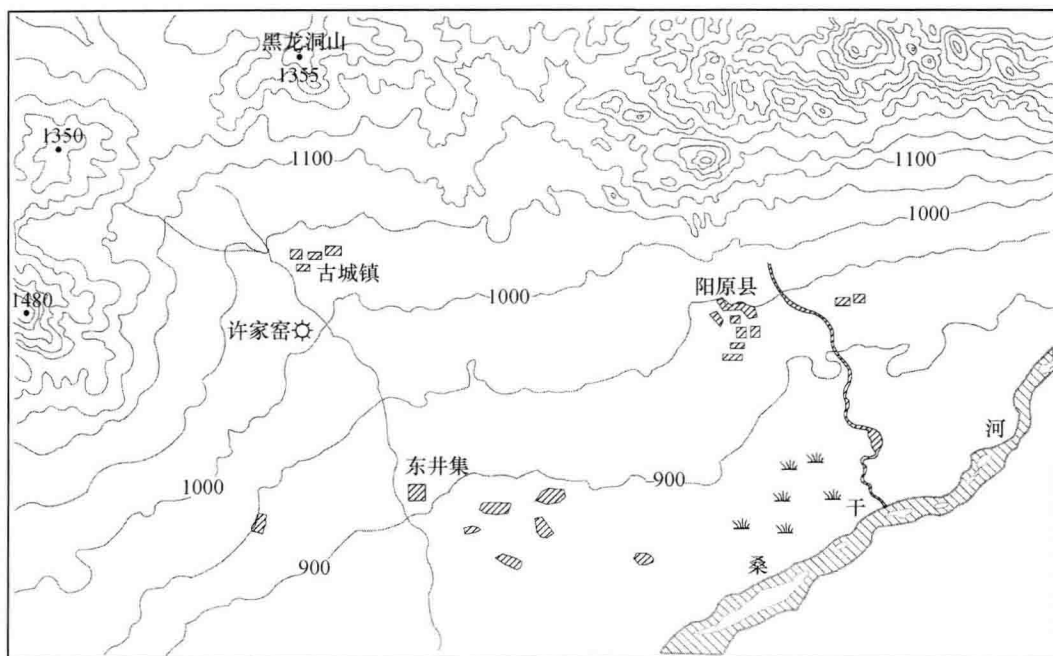


图1.1 许家窑遗址地势图

南的两叉沟。遗址分布面积很大，沿桑干河的一条小支流犁益沟两岸向南延伸，一直到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乡侯家窑村的大坡底。遗址地处1000米等高线附近，地势平坦。其西侧是南北走向、横跨桑干河两岸的黄羊尖山（2420米），经1480米山地至1350米山地。遗址北靠的熊耳山，横卧于桑干河北岸。西端邻近1350米山地北缘，自西向东，1355（黑龙洞山）、至1412米（崔家山）、1777米（武家山）、1750米（平坝山）及2035米（黄花梁）等山地连续不断，与桑干河南岸的恒山夹成一条东西近100千米、南北宽10~20千米的狭长的河谷盆地。此地因泥河湾遗址的发现而被考古界称为泥河湾盆地。据《阳原县志》（1997年）称，泥河湾盆地在200万年前是一个面积达9000平方千米的大湖。实际上，这里只能形成一个3000平方千米的湖泊，《县志》所称的9000平方千米大湖应包括黄羊尖山体以西的大同盆地。

按图1.1的等高线分布状况，可推断泥河湾湖最大时湖岸邻近1000米等高线。许家窑人的生存时期，至少应在900米等高线附近，湖水面积也达2000平方千米。当时湖边有着广阔的湿地、芦苇及草丛，这是春秋两季鱼类集群产卵的场所。产卵场一般水深0.5~1米，恰是许家窑人用木棒尖石构造的捕鱼工具发挥效用的场所。湖岸的草丛又是春季时鸟类产卵育雏的场所，鸟卵几乎是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天赐给人的财富。

按许家窑人生存时期的泥河湾湖岸位于900米等高线计，则邻近遗址周边的山地相对高程一般为300~500米，相对遗址而言为中低山，山上生长松、云杉、冷杉、蒿、禾本科、藜科等植物（《阳原县志》，1997，644页）。山地边缘又分布着大面积的缓平

的山前平地及草原。湖水面积缩小以后，除留下湿草草地及沼泽之外，还形成大面积的成片沙地，有的沙地可达几十平方千米。沙地是鸵鸟生存繁衍的重要场所。遗址中出土的鸵鸟化石表明，围猎易捕获的动物是许家窑人经常的活动。

许家窑遗址除发现鸵鸟化石之外，还发现大量的至今仍生存的动物。啮齿类的动物有鼠兔、中华鼯鼠、拟布氏田鼠。较温顺的动物有：蒙古马、野驴、赤鹿、葛氏斑鹿、普氏原羚、鹅喉羚、羚羊、野猪。凶猛野兽有狼、虎等。已经灭绝的动物有瑞曼古棱齿象、披毛犀、河套大角鹿、许家窑扭角羊、岩氏扭角羊、原始牛等。软体动物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体上皆属于北方现生种，喜栖于较温湿的丘陵地带的森林或灌丛。有塔形钻头螺、同形慢行蜗牛、间齿螺、凸圆盘螺。未见关于鸟类及鱼类化石的更多记述。

许家窑人化石主要发现于离地面8~12米的砂质黏土和黏土质粉砂中。先后共发掘获得17件，计有顶骨11块，其中两块完整；枕骨2块；左上颌骨一块并附连四颗牙齿，右侧下颌枝一块；另有单个牙齿2枚。它们代表了1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从7岁幼儿到年过半百的老人，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许家窑人头骨壁厚，但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已比北京猿人细微复杂，颅顶较高，头骨最宽处位置也靠上（王玉哲，《中华远古史》，2000，26页），与北京猿人相比，更接近现代人。许家窑人头骨同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山顶洞人一样，具备某些白种人不突出、黑种人不明显、只有黄种人显著的特征。如顶骨与枕骨之间的印加骨、下颌骨内侧面犬齿与臼齿之间的下颌圆枕等。

石球是人类在制造飞行器过程中所取得的光辉灿烂的成就。虽然它不如火的使用、陶器的发明、弓箭的制作等那样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在石器发展史中，特别是在人类武器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令我们悟到许家窑人、丁村人时代人脑结构飞跃趋于复杂、人类思维能力日臻完善、人类制造活动及完善程度更加精细。石球的大量制造是对这一切的最真实的记述。

许家窑遗址发掘石器14041件，其中石球1079件，最大者重1500克，直径10厘米；最小者不足100克，直径5厘米。有的石球滚圆，有的是半成品和毛坯，它们清楚地显示出石球制作的全过程。一个遗址中竟发掘出这么多石球，在世界考古学上颇为罕见。马



图1.2 石球

新等在专著中着重指出“石球在旧石器初期便已出现”（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2003年，科学出版社，第25页）。且“蓝田猿人与匭河遗址的石器中，曾发现一些制作简单粗糙的球形石器”（张宏彦，2003，142页）。砍斫器在石器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与石球一样，皆是捕猎野兽的重要工具。这就是说，早在距今100万~70万年，人类已有了对远投石器效力的思考及制作行为。到了旧石器中期，石球（图1.2）大量出现。张宏彦认为：由于冰期气候的影响，华北地区草原广泛发育，古人在视野开阔、不易隐藏的草原地带猎取野驴、野马、黄羊等大型群栖性动物，就需要

一种威力较大的远距离投掷武器以提高猎取的成功率。可见，生态资源与人脑进化有着密切关联。

许家窑人距今13万~10万年，这正是晚更新世距今13万~6万年白洋淀海进发生发展的时期。从距今10.5万年，海水向华北平原全面推进，直达白洋淀，海进遍布白洋淀以东广大地区。整个大陆处于气候大暖期。马兰黄土底部安氏鸵鸟蛋化石在北京斋堂、胶东邹平和辽宁等地的广泛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华北地区气候至少是干热的。优越的气候条件与丰足的动植物资源，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人们离开山洞走向旷野，促进了人们思维的转变，推动了人脑结构的复杂化。

3. 尖状器的分布及石球的扩散

标枪、石球、弓箭，广义而言，皆是飞行器，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人工制造的第一批飞行器。只不过它们的原动力源于以人类手臂为主的体内动能。它们的动能原理、飞行路线、器物结构及中靶概率等皆是今天一切飞行器的源头。无论如何复杂的工程实践，也无论如何艰难的人脑设计思维，都是从这里发源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远古人们已懂得飞行器原理。要说明的是，从100万年前到1.0万年前的一批又一批遗址中的粗简石球到较精制石器；从少量石球到大批量石球，再到少量石球，直至石球消退；以及从粗制尖状器到精制尖状器，再到少量石镞出现，再到大量的普遍的弓箭的制作及使用，是实物历史连续演化的过程，是华夏远古人们连续发展演化的实证，是任何人捏造不出来的。

尖状器（图1.3）是制作标枪或石矛尖头的基础性技术及材料，甚至有些就是主要材料（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4，112页），图1.3给出蓝田、周口店、丁村、沙苑遗址的尖状器，它们多为沿石片两边修整，使之相交成尖刃。

在旧石器时代，尖状器除精、糙制作工艺有所区别外，大小形式基本未发生改变。由此可知，标枪的枪尖部位随着时程的变化而更加尖锐，更易于射入猎物的皮肉，其他性质则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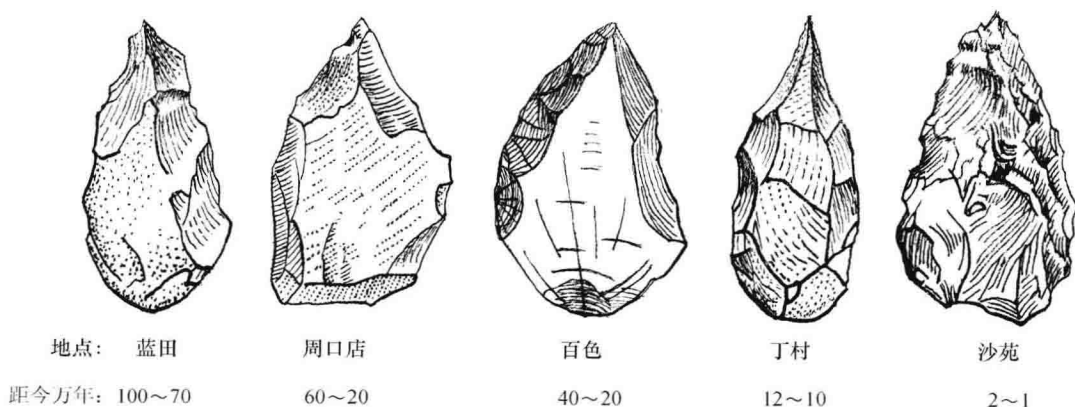


图1.3 旧石器时代尖状器

在石球发展演进过程中,丁村人遗址群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时空节点,时间上承上启下,空间上联结四面八方。丁村人处于距今12万~7万年,上接许家窑人,下承4.0万年前的小孤山和2.4万年前的下川遗址。丁村遗址群居于汾河两岸,至少已发现20多个地点留存丁村人的化石(王玉哲,25页)。丁村位于汾河东岸,依邻1403米的塔儿山西麓。塔儿山东西宽约30千米,南北长约100千米,总面积约为3000平方千米,其上布满了针阔混交林。汾河西岸为一片广阔的低山丘陵,也布满了针阔混交林。汾河从这两片百里长的山地中间穿过,此山地北端接连开阔的临汾平原,南端毗邻广阔的侯马平原。优良的自然环境提供了梅氏犀、纳玛象、扁角鹿、赤鹿、梅花鹿、野马、野驴、豺、狼、熊、狐、大群羚羊、原始牛、水牛、很大的鲤鱼和青鱼、河狸、蚌,以及螺类(王玉哲,25页;郭沫若,15页),丰富的食物资源滋养了丁村人。远古人们裸足行进在山间荒芜小路上,每天往返半径只能是30千米,丁村人恰居于这个地域的中心地带。20多个丁村人化石地点,可以认为至少有20个左右的丁村人群体生活在这个中心附近。丁村人已经走出了天然的山洞,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采取新的办法防寒、躲避风雨、保持火种、控制与管理火源。

石球虽然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出现,但其大量出现却是在许家窑时代之后。许家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石球,证明那里可能是石球的制作场。若不是石球制作场,则必是较长时期的围捕动物的狩猎场。丁村遗址较许家窑人晚,丁村诸多遗址多有石球出土。此后,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旧石器晚期遗址不断有石球出现。距今4万年前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距今2.4万年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刘家岔遗址等处石球数量较为集中(马新、齐涛,2003,27页)。郭沫若提到丁村人把石灰岩的厚而平的砾石,沿着周围的边缘对击,打制成大大小小的球形投掷器。张宏彦则讲,球形器多用质地稍软的石灰岩等材料,经打击、磕碰而成。旧石器时期,石球制作粗糙,球面棱角分明,可称多面体石球。旧石器中期以后,采用两个石球对磕碰的方法加工毛坯,且球体制作得较圆整。

当石球在某些中心出现并被继承之后,邻近这些中心的氏族人群尚未进入石球制作阶段,这时他们见到石球的功效,便要依靠相邻的这两个氏族人群的融汇性与交往性。只有两个相邻氏族人群之间有了某种形式的交流,不会制作石球的群体方能迅速地学会制作石球。有些历史文献已叙及远古时期人群有过大规模的较长距离的迁移,迁移过程有利于人们的混杂与交往,从而加速各氏族人群之间的知识与技术的交流。

4. 2.8万年前的峙峪人

距今2.8万年的峙峪人出土于山西省峙峪村,峙峪遗址位于朔州城西北15千米、黑驼山主峰东南10千米左右。峙峪西、北、南三面环山,处于七里河(又称峙峪河)二级阶地上。东及东南面临桑干河北支源马关河与源子河河谷平原及河谷湿地。峙峪人发现于峙峪河与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沙丘中,现存一块人类枕骨。遗址中发掘出10000多件石器,包括砍砸器、各类刮削器,有些已具有原始细石器形态。石器原料有脉石英、硅灰石和黑色火成岩。与峙峪人遗骨并存的有大批动物遗骸化石,其中至少有野马120

匹、野驴88头、普氏羚羊150头；完整动物牙齿5000多颗，其中野马、野驴牙齿4000多颗。峙峪人背靠的主峰高2147米、东西60多千米、南北50多千米。总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千米的黑驼山，里面的山林及灌丛的动物种类及数量皆很大，但是遗址中却以丘陵及草原的野马、野驴、普氏羚羊、鹅喉羚、披毛犀、鸵鸟等为主。

由于野马、野驴、羚羊、披毛犀、鸵鸟等动物喜栖于干燥环境，说明当时峙峪一带的气候比较干燥。但是，遗址地层中有水牛存在，而水牛是适应温暖湿润河边及沼泽环境的。李壮伟^[3]认为，水牛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峙峪地区气候温润，而很可能是动物随季节而迁居，夏季，南方动物北上，冬季，北方动物南移。倘若确实如此，则峙峪人所居存的地址很可能是一个基本稳定的临时营地。冬季来临之前，他们随着一些南迁的动物向南移行；春季，他们又沿着南下的路线返回峙峪。春、秋两季，也是峙峪比较干燥的时节，大批草原动物出现在朔州平原上，正是峙峪人狩猎的大好时期。

峙峪人用火，遗址中存留烧骨、烧石，但未发现火塘与灰烬堆。从180万年前以来，几乎无处不见火的遗迹，长时期的普遍用火应有着内在的传承与扩展机制。石球同火一样，在10多万年前许家窑人、丁村人时代已得到广泛的传承。但峙峪遗址上万件石器中几乎再未发现石球，这应如一些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石球这个经历了数万年实践的有效的狩猎武器的消失，证明其被新的更有效的武器所代替。峙峪遗址发现的石镞，虽然极少，但已代替了石球，表明实际数量应相当不少。

峙峪遗址最突出的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也是批量最大的在兽骨上的人工刻划符号和图像痕迹。刻划符号有圆点、三角、左右斜线、横竖直线、网纹等。还有在一片野马肱骨碎片上刻划的两幅狩猎图像，刻划精细，线条简洁流畅，构图严谨（杨国勇，2002，8页）。陈建生认为，这是中国文字的源（《刻划——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二》，《化石》1997年第1期）。如此而论，甲骨文字的源头确应从峙峪人开始探讨。在陶刻之前有兽骨刻划及岩画应是当时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是一种由强烈愿望驱使所造就的业绩。我们今天难以理解当时人们生活、生产与心理的状态，但兽骨刻划及岩画的制作则是他们文化思维的集中体现。

5. 弓箭代替石球

从距今10万年前后的许家窑人、丁村人大量而广泛地制造石球，到距今一万年前后较多的遗址出现弓箭，中间经历了“石球大量减少”这样一个重要过程，正如张宏彦所说：“与弓箭相适应的是石球大量减少，说明它作为一种狩猎工具已被弓箭所代替了。”（15页）。在“石球与大脑思维”相互作用中，在距今10万~5万年这个阶段，石球的投掷也从用人体手臂转变为借助绳索或5~10厘米胸径的弹力强大的去掉枝叶的树干抛投。这两者又是促进弓箭诞生的基础。飞行器的抛投方式从抛射转变为弹射，人们头脑中必须经过弹射思维的积淀。这也说明弓箭的出现应经历了由个别到普遍的演进过程。

吕振羽^[4]（44页）认为，黑龙江顾乡屯发现的石器，说明人们已知道用弓箭了。广东西樵山人已经知道用弓矢了。弓箭的出现体现了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顾乡

屯遗址的时代为距今4万~2万年。郭沫若（24页）认为：距今2.9万年的山西朔县峙峪人的石镞（如图1.4），可能已发明弓箭这种前所未有的武器。这是一件用燧石制作的锋利的尖状石镞。沙苑遗址细石器中有石镞，可以证明当时已发明并使用弓箭（王玉哲，2000、53页）。

由此可知，弓箭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前。当时的人们“还不知把石器磨光”“不知道制造陶器”“不知道把野兽驯养成为家畜”“不知道种植的方法”（王玉哲，43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在当时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弓箭未出现之前，每次围猎需10多个人甚至30多人同时投掷手中的石球或标枪，才可能制服一只较大的猎物。使用弓箭之后，3~5人就可以在距离猎物20~30米之处射杀之。弓箭击中猎物的概率改变，杀伤猎物的效力改变，人与动物之间的危险冲突显著减少，捕猎中的伤亡日趋减少。总之，当时的人们可以用较少的人力获取足够的野生动物，为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

至少可以认为，从峙峪到沙苑，距今3万年已出现了弓箭，并在距今3万~1万年有了相当迅速的传播与提高。弓箭决定性地改变了人群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改变了当时人们肉食供应的状况，从而在本质上改变了人群内部的劳动分工。弓箭在人群中具有足够数量时，精壮劳力提着弓箭与标枪出去打猎，老、弱、病、孕、残皆可留居营地，从事其他工作。比如运取柴材、控制火堆、看管捕获到的山兽、挖采更多的野生植物的可食部分，春季还可捕捉螺、蟹，拣取鸟蛋，等等。充足而多样的食物进一步促进了人体各个器官的平衡发展变化，人们的创造能力、劳动技巧、生殖繁育能力增强，进而人口迅速增加。

弓箭的使用与普及使劳动力分流，导致狩猎之外的时间增多，剩余食物出现，确保人口增加的诸多条件出现，等等，使当时的人们有更充裕的劳力和时间磨制工具、修缮窝棚或窑坑、留存种子及野兽的幼仔甚至制作装饰品。总之，弓箭越普及，弓箭制作越精良，捕猎效率越高。捕猎效率越高，则可分流的劳力和狩猎外的时间越多，人们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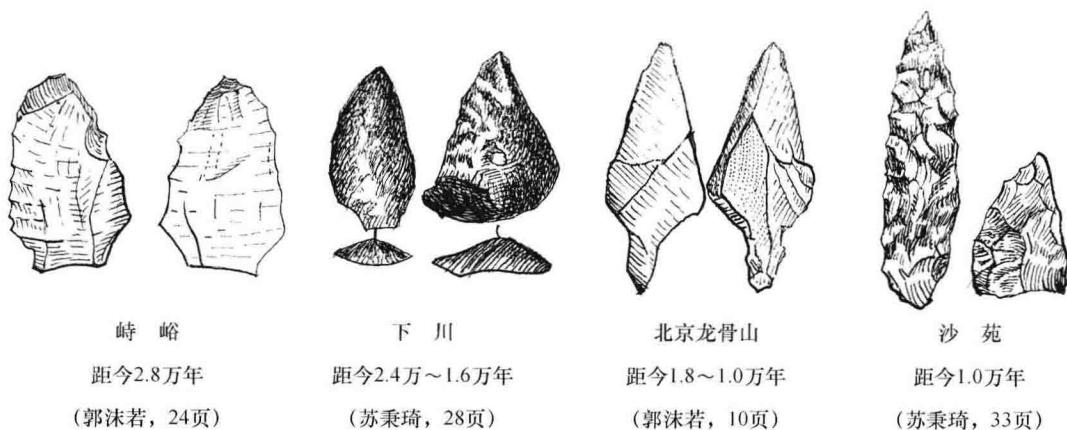


图1.4 箭镞石器

其他方面的工作和思维越充分，此时的人类得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远古关于弓箭狩猎最多又最形象的记述应是贺兰山与阴山岩画，据岩画研究者推断，它们出现在距今1.0万~0.4万年。岩画的弓箭形象在“天书”专题中也有简介。

“天书”中已强调《山海经·大荒经》及《山海经·海内经》是“天书”，是久远以前的岩画。《山海经·海内经》记述：“少皞生般，般始为弓矢。”少皞即少昊，矢即箭，这应是中国关于“始为弓矢”的最早的文字记述。它说的可能是某一个地域或某一氏族群体“始为弓矢”者为“般”，即便如此，始作弓箭也应在旧石器时代之末、新石器时代之初。少皞是何许人？按《左传》将其与黄帝、炎帝、共工并列，《大荒经》将其与女娲、伏羲同提，《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记述：“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弃其琴瑟。”可知少昊确有其人或其氏族。他们的来源及存在也是源远流长的，而且在东方。少昊氏族群中最早制造弓箭的人是“般”。这应是一幅久远的岩画，是关于中国弓箭制造的最可贵的文字传承。可以说：弓箭早已有之，文字创造还必是基于岩画或骨刻、陶刻符号。

6. 一万多年前的虎头梁遗址

距今一万年前后，距今1.3万~0.8万年，正值冰河期后升温期，是华夏新旧石器时代之间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弓箭开始传播，陶器不仅出现且开始传播，石器较普遍出现局部磨光现象，初始农具及初始农耕出现，窝棚应已较多出现。李衡眉（2001，29页）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其分布范围除华北、西南等传统地区外，北达黑龙江，东到浙江、台湾，南抵云贵、两广，西至青藏高原。现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遗址的总和^[5]。

中国远古史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气势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局部磨光石器、弓箭、陶器、新的有组织的繁育人口等重大的划时代标志之外，人群从局部的数量有限的山洞走向旷野，由暂时居住在一个地点向初始定居转化。简易的避风雨、防严寒的蓬草窝棚也是这一时期人群的重要成就。张宏彦（2004，190页）认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过一些旷野类型遗址，如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朔县峙峪、阳原虎头梁和四川汉原富林遗址均发现有灰烬等用火遗迹，可知曾有人在此居住过。推测这类遗址的房屋，可能是用树干、树枝、树叶、茅草、兽皮等材料搭造的窝棚式建筑。利用简易材料建筑住房，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文化的主要成就之一。”

泥河湾湖东南岸的虎头梁遗址，距今1.3万~1.0万年，倘若也计入这一时期，则它有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就是遗留在野地上的三个灰烬遗迹。《县志》称其为炉灶坑，有人称其为“篝火遗迹”，还有人称其为“火塘”。仔细辨识“火塘”或“炉灶坑”的具体情形，便知这确实是个坑或塘。南侧编号为H3-5的“坑”呈长椭圆形，长1.7米，宽0.8米，深5~16厘米。另一个椭圆形火塘宽1.8米，长近4米。北侧圆形火塘直径为1.8米，如图1.5所示。“坑”的存在表明在生火之先已用石器修葺深浅及大小，这是为了维持较长时间的燃烧而为。按南侧火塘1.8米计算，火塘两侧各应有2米宽的活动